

9-2006

大陸上的中國近代海軍史研究, 1949-2000

Youyuan MA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1999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馬幼垣 (2006)。大陸上的中國近代海軍史研究, 1949-2000。《嶺南學報》，新第三期，304-338。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99/vol3/iss1/13

This 專研近貌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Centre for Humanities Research 人文學科研究中心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999-2006)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大陸上的中國近代海軍史研究，1949-2000

馬幼垣

嶺南大學

一、討論的範圍

海軍指兵種而言，故本文的討論不會涉及「海防經濟」那類虛無縹緲，隨意衍生，難立明確定義，無法指出與海軍這兵種有何直接關係的事物。時間上的規限則有二。一是涵蓋時段自同治年間至1949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目前的情況尚不容大陸學者對其後海峽兩岸的海軍發展，作出超乎政治要平的平情分析，而且大陸方面的檔案還未公開，故1949年9月對研究者之為不易突破之關卡勢必會維持一段時間的。二是所收研究作品的出版期以2000年為下限。這是客觀情形使然，不必拘泥五十年之整數(即若以1999年為下限)，因為本文脫稿時(2001年4月)已得見2000年有若干種必須記錄的作品。

討論的作品以書籍為限。學報論文並不反映從書籍看不到情形，故僅作若干概括性的評論。

二、海軍史研究肇始期

北洋政府海軍部聘請海軍耆宿嚴復(1854-1921)任監督，委副官池仲祐(1861-?)編撰的一系列書籍，如《海軍大事記》(民國七年海軍部本)、《海軍實紀——購艦篇造艦篇》(民國七年海軍部本)等書。這些書(首版往往是線裝本)基本上都很簡陋，而且誤漏百出，遺害無窮。

其後，郝培芸(1899-?)(煙臺海軍學校年第十六屆[1924年])有本字大書薄的《中國海軍史》(北平：武學書館，1929年)。此書除了排比池著各書所有者外，所增新知極有限。

以後就是抗戰期間海軍總司令部在大後方所編刊的《海軍抗戰事蹟》(重慶：海軍總司令部編譯處，1944年)、《海軍戰史》(重慶：海軍總司令部，1941年)等戰地報告性的書(這類報告有不少僅編就稿本，並未刊行)，^[1]以及抗戰期間海軍人士偶可一見的私家著述。^[2]

這些海軍界出版的書籍在當時都說不上有影響力。海軍人士的私家著述(如郝培芸的)流通有限，而官方書刊又只是軍方範圍內的讀物，都帶動不出廣泛的興趣。此等刊行有年之物有些現在已頗常見，那是拜五六十年代以來各種影印本和轉載品所賜(如池仲祐《海軍大事記》已稱得上用者人人有之)。但若懷疑排印出來的轉載品有刊誤，要找原版來看的話，便會十分困難。從未公開複製發售的，如《海軍戰史》，用者就只有自想法子了。

談得上有影響的是海軍圈外的學者偶爾發表的文章。張蔭麟(1905-1942)即曾寫過這樣一篇屢被引用的論文。^[3]惜史家長於發掘資料的本領卻掩蓋不了彼等缺乏海軍知識的弱點。^[4]

大抵而言，肇始期研究成果的影響力要待翻印、複印、轉載這類衍生工具流行後，助其播佈，始顯現出來。

三、文革前的史料準備期

1949年臺灣海峽兩岸分治，研究近代史者遂久斷交往，而大陸學者更長期

^[1] 現藏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南京)的《海軍戰史續集(卅年至卅四年)》，以及現藏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臺北)的《海軍抗戰史料》(1939年)、《海軍抗戰軍事報告》(1940年)可代表這類抗戰時期編寫而迄今仍未刊行的稿本。

^[2] 例如曾國晟(1899-1979，煙臺海軍學校第十屆，1921年經由吳淞海軍學校深造畢業)用翁仁元筆名出版的《抗戰中的海軍問題》(無出版地：黎明書局，1938年)。此書因出版時地的關係，現已為奇罕之物，幸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尚有度藏。

^[3] 張蔭麟，〈甲午中國海軍戰蹟考〉，《清華學報》，卷10期1(1935年1月)，頁61-96；後收入包遵彭、李定一、吳相湘編，《中國近代史論叢》，第1輯，冊6，《第一次中日戰爭》(臺北：正中書局，1956年)，頁245-277；並收入《張蔭麟文集》(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6年)，頁170-200。

^[4] 鄭天杰、趙梅卿，《中日甲午海戰與李鴻章》(臺北：華欣文化事業中心，1979年)，頁185-205，就花了不少篇幅去更正張蔭麟所犯的錯失，而這些錯失大多與張海軍知識貧乏有關。

陷於閉門造車之境。海軍史的研究，臺灣在五六十年代已有嚴正的成績。^[5]大陸方面卻不能這樣說，彼等有者只是幾種涉及海軍史事的史料集，即中國史學會主編之《中國近代史料叢刊》中的《中法戰爭》(上海：新知識出版社，1955年)，七冊；《中日戰爭》(上海：新知識出版社，1956年)，冊7；《洋務運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冊8。這些史料集固然很有用(正因它們有用，楊家駱[1912-1991]不獨在他經營的世界書局[臺北]公然盜印[1963年]，還冠以自己的姓名充編者)，但所收資料的奇罕程度還是不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刊的《海防檔》(1951年)，冊9。

文化大革命爆發(1965年秋)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紮根期，歷史研究的工作由前朝舊人來承擔。此輩學人並沒有專志海軍史者，而推動大型人力密集式的文史工作又是慶新朝的傳統，^[6]遂有上列史料集的湧現(當時推出的史料集尚有與海軍無直接關聯或關聯不大的《太平天國》、《戊戌變法》等，整個系列總數達十一種)。另值得一提的是整理清季籌海大員文牘的先例。劉坤一(1830-1902)四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一任兩粵總督，是發展南洋海軍和粵洋海軍(特別是前者)的關鍵人物。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編的六冊本《劉坤一遺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開整理此類文牘之先河。

在這段史料準備期裏，真正的海軍史研究除在當時尚數目有限的學報內偶見之文章外，當推戚其章(1925-?)《中日甲午威海之戰》(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62年)。此書確是大陸近五十年來研究海軍史的開山之作。

四、文革結束至今的研究成果

大陸學者治中國近代海軍史，研究見成績主要還是八十年代中期以來之事。成績可分三方面來說。

[5] 雖然這段時間，在臺研究海軍史者可說僅得包遵彭(1916-1970)一人，頗似獨力支撐大局，但其一冊本初版《中國海軍史》(左營：海軍出版社，1951年)、兩冊本增訂版《中國海軍史》(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70年)，以及《清季海軍教育史》(臺北：國防研究院，1969年)，確均為創導行頭之作。

[6] 宋初編刊《文苑英華》、《太平御覽》、《太平廣記》這類大型書刊可說是這傳統的開端。明初以《永樂大典》繼續此傳統。清初編集《四庫全書》，編刊《古今圖書集成》，撰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更把人力密集地編刊大型書籍的傳統推到高峰。

1. 編刊史料

編刊出來的史料集性質與文革前的工作承接相連，數量亦可觀，具代表性者計有：

季平子、齊國華編，《甲午中日戰爭——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982年)，冊2。^[7]

* 張俠等編，《清末海軍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申報》(上海：上海書店，1982-1986年)，冊400。

顧廷龍、葉亞廉編，《李鴻章全集——電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987年)，冊3。^[8]

* 楊志本主編，《中華民國海軍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年)。

蔣廷黻編，《籌辦夷務始末補遺》(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冊9。^[9]

* 中法鎮海之役資料選輯編委會，《中法戰爭鎮海之役史料》(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年)。

^[7] 此書的重要性已因出版後之發展而頗減，用者因而需並觀其他較近刊佈的盛宣懷(1844-1916)文件。事緣1983年旅日文獻家程伯奮以所藏盛宣懷與親友往來函電七十七冊售予香港中文大學。該校隨即委託王爾敏(1927-?)、吳倫霓霞等選輯整理，按主題分集出版(每集均相當厚)。已刊且與海軍關係較密者包括吳倫霓霞、王爾敏編，《盛宣懷實業函電稿》(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3年)，冊2；吳倫霓霞、王爾敏編，《清季外交因應函電資料》(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3年)。此套資料雖已刊出六集，據云尚可用主題方式再出五集。關心此事者應繼續留意。

^[8] 吳汝綸(1840-1903)編刊的傳統《李文忠公全集》頗有刪減。此書據上海圖書館所藏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1823-1901)的文牘原件重新整理出版。先刊份量較少的電稿部分。唯分三次出了三冊後，計劃即告中止，連電稿部分也不刊完。後來安徽淮系集團研究中心宣佈全套由彼等從頭再整理，另作印發。工作進行已十數載，聞說尚需三五年的時間。

^[9] 此書據蔣廷黻(1895-1965)在三十年代就故宮軍機處檔案抄錄，以補《籌辦夷務始末》的稿本影印而成。其涵蓋範圍(道光元年[1821]至同治四年[1865])視始自道光十六年(1836年)的原本《籌辦夷務始末》早十五年，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用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2)所提供以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咸豐十一年(1861年)為範圍的抄件編刊而成的《道光咸豐兩朝籌辦夷務始末補遺》增出尤多。

戚其章主編，《中日戰爭》(《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9-1996年)，冊12。^[10]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and)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ASS, compiled, *Archives of China's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onfidenti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Robert Hart and James Duncan Campbell, 1894-1907*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0-1993), 4 vols.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海關密檔——赫德、金登幹函電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90-1996年)，冊9。^[11]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汪偽政府公報》(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冊15。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汪偽政府行政院會議錄》(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年)，冊31。

萬仁元、方慶秋編，《中華民國史史料長編》(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冊70。

* 高曉星編，《陳紹寬文集》(北京：海潮出版社，1994年)。^[12]

* 中國艦艇工業歷史資料叢書編輯部編，《中國近代艦艇工業史料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 謝忠岳編，《北洋海軍資料彙編》(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4年)，冊2。^[13]

[10] 此書賡續1956年新知識出版社首刊，後被楊家駱盜印為《中日戰爭文獻彙編》之《中日戰爭》七冊本資料集。因兩集之間無重複，故應合為一套大書來用。

[11] 這套書是上列一書的中譯本。收此二書入目內並非謂海關為海軍的一部分，而是因為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和其助手金登幹(James Duncan Campbell, 1833-1907)直接間接曾多次參予清季籌海活動，故此二書保存不少獨得的海軍史料。

[12] 自同治末年開始籌海以來，掌中國海軍者以陳紹寬(1898-1979)為最久。他在不同頭銜下，實際掌管中央海軍差不多十九年(1927年5月至1945年12月)。

[13] 此書收錄之物有稀見者，也有習見者。上冊收：《丁汝昌；海軍函稿》、《賀總憲議海防折》(賀總憲即賀壽慈，1810-1891)。下冊收：周馥，《醇親王巡閱北洋海防日記》、《北洋海軍章程》、《海軍大事記》、《海軍實紀——述戰篇》、《海軍戰役陣亡死難群公事略》(以上三種均出池仲祐之手)。

* 王潔玉編，《道光間廣東防務未刊文牘六種》(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4年)，冊2。^[14]

衛藤瀋吉、李廷江編，《近代在華日人顧問資料目錄》(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

張振鷗主編，《中法戰爭》(《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2002年)，冊4。^[1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冊3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摺》(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冊120。

秦國經主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冊30。

* 戚俊杰、王記華編校，戚其章審訂，《丁汝昌集》(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年)。^[16]

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冊12。^[17]

[14] 此書所收文牘雖限於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至三十年(1850年)者，時清廷尚未發展新海軍，然文牘所講虎門等地的新防禦設施每有下迄抗戰仍使用者，故收此書入目內。

[15] 此書與1995年新知識出版社首刊之七冊本《中法戰爭》資料集串連，兩者之間並無重複。唯此書尚未刊完，也不知還有幾冊待刊。這是大陸近年出版大套學術書籍的常見現象，既不公佈出版時間表，又不明言全套共有幾冊(連計劃出幾冊的話也往往不肯說)，只是斷續地偶出一冊(此書之第二、第三兩冊和第三、第四冊之間均各就遙遙相去三年，甚至到了只是另外三年後之今日，仍不知究竟還會不會有第五、第六冊)，有時甚至顛倒冊數次序地出版(上列同屬一叢刊之《中日戰爭》資料集便有此毛病)，以致讀者窮追久候，疲倦不已，而在買齊全套前仍無法知道有無漏購。為甚麼不可以一開始就簡簡單單告訴讀者待整套出齊會有幾冊？

[16] 陸軍出身的丁汝昌(1836-1895)是李鴻章委派自始至終負責發展北洋海軍的親信。此書我曾作書評，見《嶺南學報》，新2期(2000年10月)，頁356-358。

[17] 張之洞(1837-1909)是發展粵洋海軍和南洋海軍(特別是前者)的關鍵人物。此書較許同莘(?-1922年前後在世)編的傳統《張文襄公全集》增出五百餘萬字。

此等史料集中的海軍史料一般都相當零散，需細心爬梳，始能有獲。專為海軍史研究而編者僅冠以*號之八種，其中《中國近代艦艇工業史料集》為併湊現成資料之物，所增新件極有限。

2. 海軍史研究書刊

僅列專討論海軍史事，且具代表性者，通論李鴻章、嚴復、中國近代軍事活動、近代軍事教育之類題目者，以及論述與中國海軍無直接關聯之外國史事者和翻譯之作均不收。陳陳相因，篇幅有限的所謂海軍通史亦不收：^[18]

孫克復、關捷，《甲午中日海戰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戚其章，《北洋艦隊》(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

戚其章，《中日甲午戰爭史論集》(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3年)。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江南造船廠廠史(1865-1949.5)》(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19]

林萱治主編，《福州馬尾港圖志》(福州：福建省地圖出版社，1984年)。

孫克復、關捷，《甲午中日戰爭人物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福建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法戰爭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紀念馬江戰役一百週年》(福州：福建論壇雜誌社，1984年)。

福建省博物館《福建文博》編輯部，《中法戰爭閩臺戰場專輯》(《福建文博》，1985年期1 [1985年])。^[20]

^[18] 前此還有一本文革時期所寫，內容簡略得多，且專從政治角度出發的，現在只宜作反面教材式史料看的江南造船廠史編寫組，《江南造船廠史，1865-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19] 讀這種研論時不必參考之通史包括：張墨、程嘉禾，《中國近代海軍史略》(北京：海軍出版社，1989年)；吳杰章等編，《中國近代海軍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

^[20] 此冊雖為學報《福建文博》的一期，但該冊自封面至封底講的全是中法戰爭期間閩臺區戰事，且厚二百四十餘頁(十六開)，故宜以專書視之。

戈今、陸其明，《南京江面上的壯舉——記林遵將軍率國民黨第二艦隊起義》(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年)。^[21]

林慶元，《福建船政局史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有1991年書名和出版社均乃舊的修訂本。

山東省歷史學會編，《甲午戰爭九十週年紀念論文集》(濟南：齊魯書社，1986年)。

盧漢超，《赫德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22]

《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當代中國海軍》(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23]

沈傳經，《福州船政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王植倫、高翔，《薩鎮冰》(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

陳書麟編著，《陳紹寬與中國近代海軍》(北京：海洋出版社，1989年)。

周宏冰、方舟，《海軍上將之戀——南京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海軍總司令陳紹寬紀事》(北京：海軍出版社，1989年)。^[24]

楊東梁，《大清福建海軍的創建與覆沒》(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

^[21] 此書或從未向大陸以外發售，幸承海軍航空工程學院(煙臺)教授蘇小東複印寄贈。前此有一篇題目幾全同，內容亦差可比擬，而文字較略的陳務篤，〈南京江面上的壯舉——國民黨海軍第二艦隊起義前後〉，《江蘇文史資料》，期8(1982年1月)，頁152-193。此不易一見之文承海軍指揮學院(南京)海軍史館館長高曉星寄贈。

^[22] 赫德所任職雖為中國海關總稅務司，其與中國早期西式海軍的發展卻深有關係。這種關係尤以見於北洋海軍籌建時期者最為明顯。

^[23] 此書雖以「當代」為標題，且述事至1985年底，對1949年國共內戰期間的海軍活動仍有相當敘述。書中對為數甚眾的國府艦隻在投共後如何易名，如何變編，僅提供很零碎的消息。

^[24] 此書雖以小說體出之，實則為根據訪問陳紹寬兩得力助手曾國晟、周應驄(1900-1985，煙臺海軍學校第十三屆，1921年經由吳淞海軍學校深造畢業)的訪問紀錄而寫成，故可視為口述歷史。另外一本講陳紹寬傳記的書，林純，《孤獨的將軍》(廈門：鷺江出版社，1987年)，則當視作純小說。

盧如春等，《海軍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25]

鮑志行，《中國海防的反思——近代帝國主義從海上入侵史》(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0年)。

張晞海、王翔，《中國海軍之謎》(北京：海軍出版社，1990年)。

程浩，《中山艦傳奇》(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1990年)。

駐閩海軍軍事編纂室，《福建海防史》(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0年)。

于輝(于耀明)、張東甲，《大沽炮臺》(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0年)。

關捷、劉志超，《沉淪與抗爭——甲午中日戰爭》(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

姜鳴，《龍旗飄揚的艦隊——中國近代海軍興衰史》(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91年)。

湯銳祥，《護法艦隊史》(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年)。

陳書麟、陳貞壽，《中華民國海軍通史》(北京：海潮出版社，1992年)。

海斌，《留美海軍風雲錄》(北京：海潮出版社，1992年)。

張序三主編，《海軍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3年)。^[26]

[25] 此書情形與《當代中國海軍》一樣，在其述事偶至1988年間的範圍內包括1949年的海軍活動。其所提供國府艦隻投共後的消息亦很零碎。

[26] 此書對理解基本和現代海事/海軍的專門辭彙很有用，但涉及海軍歷史的部分則處理得馬虎之極，十分令人失望。這樣下評語，可就三方面指出其嚴重不足：(一)艦種、武器、艦隻細部：加護巡洋艦(protected cruiser)、魚雷砲艦(torpedo gunboat)、蚊子船(Rrendel gunboat)、護航驅逐艦(destroyer escort)、杆雷(詳後)、X磅彈砲、早期艦用機關鎗/砲(如自光緒中期至抗戰勝利好一段漫長時間普遍用於中國艦艇的各款努登飛[Nordenfelt]、哈乞開斯[Hotchkiss]、格林[Gatling]、路易士[Lewis]、馬克沁[Maxim]產品)、衝角(ram)、戰盤(military top)、露砲塔(barbette)、艦首砲(chaser)、艦載武裝小艇(armed vedette)、舷臺(sponson)、中央砲臺(central battery)、舷裝砲臺(broadside battery)、艦殼內傾(tumblehome)等有關十九世紀最後三十年和二十世紀首二十年海軍艦隻的辭彙均應各有條項。(二)艦隻：自同治末年開始籌海至抗戰勝利，中國海軍艦隻數目不算少，此書僅用四頁的篇幅(頁942-945)來讓十四艘艦有專條，少得離譜，每條的長度也短得可憐。整個清季時期的南洋海軍、閩洋海軍、粵洋海軍合起來竟沒有一艦上得此名單！這張艦隻名單連最起碼的代表

林偉功、黃國盛編，《中日甲午海戰中方伯謙問題研討集》(北京：知識出版社，1993年)。

湯銳祥，《孫中山與護法海軍論集》(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3年)。

鄭劍順，《甲申中法馬江戰役》(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3年)。

鄭劍順，《福建船政史事紀要編年》(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3年)。

性也談不到。這本辭典對艦隻的忽視嚴重到連中國在抗戰勝利分得數十艘日本賠艦，這樣大的事也隻字不提。最荒謬者如解放軍海軍到此書出版時雖已有四十多年歷史，所屬艦隻除三艘「投誠」艦外竟沒有一艘有專條(同時期的海軍人物卻傳列二百餘人之多[見後]，難道這幾十年的中國海軍有人無艦！就算講「黃安」、「重慶」、「長治」這三艘「投誠」艦，說的也僅限於它們的「起義」(頁983-984)，而不提它們如何在解放軍海軍中服役；其中「重慶」和「長治」還在書中其他部分另立條項(頁945)。為此等艦隻立條項，標題用的全是「投誠」前的艦名，而不採編入解放軍海軍後的新名(「重慶」艦沒有選擇，可以不算)。這就顯得連立場也糊塗了。「重慶」號雖獲得兩條項的優待，與其同時來華的另一艘英援艦「靈甫」號卻全書無隻字提及；無他，一「起義」，一不「起義」，政治掛帥也。「黃安」的前身正是上面提及的日本賠艦(原為日艦「海防八十一」號)；此書說「黃安」易幟後更名「瀋陽」，其他就不說了。這裏看得出編撰者的思維，即使對歷史有交代必要的話，倘說了而收不到政治效益，還是不說為佳。(三)人物：自鴉片戰爭時期至抗日戰爭結束，海防/海軍人物在此書得立傳者三十八人(頁957-966)；這個只嫌不足的數字還包括不少相當邊緣性的人物。高曉雲、梁梓芳、葉琛、林森林、陳善元、丁兆申等(此等人物起碼收了十個，佔所收近代海軍人物總數百分之二十六)，這種人物之不必收入篇幅雖未必要嚴控，但收錄人物必須按事功定取捨的辭典，而不能單憑戰歿(那些小小人物的共同點)便替他們立傳入冊。反過來說，無論李鴻章、左宗棠(1812-1885)、劉坤一、張之洞諸人功過如何，倘他們未嘗參予籌海，自光緒初年至抗戰期間的中國海軍根本就不會是那樣子(他們安排置備的艦隻不少服役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甚至到了五十年代仍有存者)。一本厚達一千五百多頁的海軍辭典竟容不下他們的專條，卻有篇幅留給那組鮮有事功可述的小小人物，本末倒置的程度不可謂不極。其實除李鴻章等若干大員外，一本足用的，以中國為中心的海軍辭典絕對沒有理由不替以下諸人立傳的：裴蔭森(1823-1895)、許景澄(1845-1900)、魏瀚(1851-1929)、葉祖珪(1852-1905)、劉冠雄(1858-1927)、程璧光(1861-1935)、蔡廷幹(1861-1935)、杜錫珪(1874-1933)、楊樹莊(1882-1934)、陳季良(1883-1945)、湯薌銘(1883-1975)、高憲申(1888-1948)、招桂章(1889-1953)、陳訓泳(1890-1949)、任援道(1890-1980)、陳策(1893-1949)、李世甲(1894-1970)、歐陽格(1895-1941)、巴玉藻(1892-1929)、曾以鼎(1897-1928)(注意：在辭典中立傳不等於立牌坊。凡夠代表性者，不論其事跡正反意義如何，均需立傳，不然辭典就會失去供查檢資料的作用淪為可悲的政教工具)。外人對中國籌海事業確有貢獻者，如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 1835-1886)、琅威理(William Metchaff Lang,

姜鳴，《中國近代海軍史事日志(1860-1911)》(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27]

薩本仁，《薩鎮冰傳——一生跨越四個歷史時期的近代愛國海軍宿將》(北京：海潮出版社，1994年)。

中日甲午戰爭博物館、北京圖書館閱覽部，《中日甲午戰爭研究論著索引(1894-1993)》(濟南：齊魯書社，1994年)。

(中國)海軍司令部近代中國海軍編輯部，《近代中國海軍》(北京：海潮出版社，1994年)。

趙振愚主編，《中外海戰大全》(北京：海潮出版社，1995年)。^[28]

林濂藩，《中日甲午海戰百年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

戚其章、王如繪編，《甲午戰爭與近代中國和世界——甲午戰爭10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馬昌華主編，《淮系人物列傳——文職、北洋海軍、洋員》(合肥：黃山書社，1995年)。^[29]

1843-1906)，至因而捐軀者，如馬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 1860-1897)，亦應有傳，以示中國人念情的美德。與上述嚴重缺漏情形成極端對比的是選予解放軍海軍有關人物時所採的寬容尺度。此書用七十多頁的浩大篇幅(頁328-336，994-1060)來為二百三十七個此等軍人立傳。新舊人物之間比重的極度分歧顯為編者有意識的選擇。如果值得撥七十多頁給1949年以後始見事功的人物，記錄自同治末年至國共內戰時期的人物就一百頁也絕不夠用(即使此部分過百頁也當沒有篇幅容得下高曉雲那類小小人物)。比例失調應是不難避免的缺點。

[27] 此書為姜鳴，《中國近代海軍史事編年(1860-1911)》(北京：海軍軍事學術研究所，1992年)之修訂本。美觀而且較充實之修訂本比起試行本倒有一不足之處。試行本每條均注明史源，很有用，修訂本卻全刪去。可惜試行本是軍方機構的內部發行人品，不公開發售，故十分難得，因此本文不另列試行本。

[28] 此書原計劃由海潮出版社依上中下三編，分三冊出版。上冊刊於1990年，中冊刊於1991年，下冊則從未單獨發行。此處開列者為三冊之合訂本(即下編部分僅見合訂本)。中國海軍史事見上編及下編。

[29] 馬昌華另編有此書之姊妹作：《淮系人物列傳——李鴻章家族成員、武職》(合肥：黃山書社，1995年)。書內有若干與北洋海軍有關人士的傳記，可一併參用。

海軍學術研究所、中國軍事科學辦公室，《甲午海戰與中國海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

福建船政學校史志編纂委員會，《福建船政學校校志》(廈門：鷺江出版社，1996年)。

戚俊杰主編，《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5年)。^[30]

王宜林，《甲午海將方伯謙》(北京：海潮出版社，1997年)。

關捷主編，《甲午國恥叢書》(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7年)，包括以下六書，不分列：李曉菲等，《忠魂——甲午戰爭的故事》；楊惠萍等，《國殤——甲午戰爭至甲辰戰爭》；龜井滋明(高永學等譯)，《血證——甲午戰爭親歷記》；郭鐵椿，《恨海——甲午大連之戰》；關捷，《覺醒——甲午風雲與近代中國》；韓俊英等，《史鑒——甲午戰爭研究備要》。

方杰，《沉浮中山艦》(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修訂本)(初版亦同年出版)。

施占秀等，《中山艦》(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

曾錚、曾憲，《風雨中山艦》(廣州：花城出版社，1997年)。

黃振南，《中法戰爭諸役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

陳明福，《重慶艦舉義紀實》(北京：九洲圖書出版，1998年)。

戚其章，《晚清海軍興衰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中國海軍百科全書編審委員會，《中國海軍百科全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冊2。^[31]

^[30] 此書雖非正規史學著述，且有導遊成分，然於現存甲午戰爭文物(特別是存於該館及劉公島一帶者)以及北洋海軍人物後人近況，消息頗有獨得之處。

^[31] 注26所說《海軍大辭典》的缺點，這部百科全書都悉數承襲了。編寫此兩書所採的思維方式基本上是一樣的。還有，這類辭書對國共內戰時期投共的國府海軍人物特別苛刻，試看那時期蜂擁投共者有幾人的傳記見於此等辭書，便知究竟了。

皮明麻等，《中山艦風雲錄》(武漢：武漢出版社，1998年)。

戚俊杰、劉玉明編，《北洋海軍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

蘇小東，《中華民國海軍史事日志(一九一二年一月——一九四九年九月)》
(北京：九州圖書出版社，1999年)。

王宏斌，《赫德爵士傳——大清海關洋總管》(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0年)。

陳明福，《中山艦沉浮紀實》(北京：海潮出版社，2000年)。

山大柏，《我是日軍翻譯官——偽滿江上軍親歷記》(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00年)。

董晨鵬，《炮打紫石英號——中英長江事件始末》(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沈順根、錢秀貞，《中國炮臺風雲》(北京：海潮出版社，2000年)。

以上兩組書目內有一出版社需略作解釋。八十年代的海洋出版社和九十年代年以來的海潮出版社同是一家，名稱更換而已，即中國海軍部刊行對外公開發售書籍的機構。兩者之間還有一段短短時期取名海軍出版社。周宏冰、方舟的《海軍上將之戀》即用該出版社名稱刊行。^[32]

3. 爭議性的課題

因為書刊多數是通史性質的，連學報論文亦多如此(以學報篇幅的有限，當以邁進求新為務，卻仍充斥魏源(1794-1857)海防思想、沈葆楨(1820-1879)偉大貢獻、李鴻章海防策略、福州船政局為海軍搖籃、中國海軍長江抗日之類，

^[32] 1989年出版之唐志拔《中國艦船史》亦用此出版社名稱。此書不列入「海軍史研究書刊」內，一因其為淺談性的普及讀物，二因自晚清至國共內戰結束好一段漫長時間的新式海軍發展階段，該書僅在書末用粗枝大葉、草草帶過的方式略說而已。注19提及的《中國近代海軍史略》也是海軍出版社的刊物。

千篇一律，無聊透頂，浪費資源，只謀簡介，不圖深思，弗求突破，麻木讀者思考的所謂論文)，影響所及，甚至在處理專題時亦往往用寫通史的手法，不管如何，可簡就簡，能略便略，以致愈鑽愈深，愈談愈廣的爭議性課題並不多見。

見到者，可舉二例：

- (一) 甲午戰爭黃海海戰中方所採陣法的正誤問題^[33]
- (二) 北洋海軍將領方伯謙(1852-1894)枉死與否問題

前者可能是最早的海軍史爭辯專題，談了幾十年，但許多基本問題始終未論及，如中方所採陣法最初是誰建議的和最後是誰敲定的，以及兩版本之間異同如何；組成首陣的艦隻(特別分配在陣旁的次要艦隻)是怎樣選出來的；日方有無預知中方所採陣法的可能；當時世界先進海軍國家遇到同樣艦隻組成成分時會採用甚麼陣法。

後者是鄉土觀念作祟，以致小題大做的好例子。在閩省學者的思維邏輯裏，閩籍海軍將領平庸苟且，甚至變成敗類，是不可思議，絕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於是不惜強辯，在別無實證的情況下，硬要封儒夫方伯謙為才智膽識俱優的大英雄。晚清民初海軍將領，閩人以外，以粵省人士為最多。幸而迄今未見粵人學者竭力為粵籍海軍將領誇耀、申辯的無聊之舉。

五、今後研究受制於嚴重的局限性

從最近幾年所出版的刊物去看，大陸上的近代海軍史研究有已達終極，變成原地踏步之像，不單難謀突破，且有往後倒退之迹。導致這種狀況的原因不算少。

^[33] 在本文的討論年限內，首次討論北洋海軍在黃海海戰所採用陣形的是郭澍，〈黃海大戰中北洋艦隊的陣形是否正確〉，《文史哲》，1957年10期(1957年10月)，頁63-65。以後筆戰之局成，討論連延數十載，參加的也就包括好幾代的學者。最近幾年少見這類文章，但這並不代表討論已告終結。

1. 研究近代史而不注重外國史料和論著

不懂甲骨文和不爛考古而治商代史是匪夷所思之事。可是遇到同樣情形，不能直接運用英法日等外文史料和論著而治近代史，在大陸上卻天經地義，絕不會令人側目。近代史事有涉外成分者幾避無可避。要是僅通過別人翻出來，零零碎碎，復無品質保證的譯件去作研究，這種自欺欺人的所謂研究不弄也罷，何必勞民傷財！

在日本刊行的論文集裏，經常會除日文文章外，用原文直刊的法子發佈以中、英、法、德文寫成的論文，怎會弄出設立專門期刊去發表外文論文譯件，那種丟人現眼的勾當！^[34]不先具備足夠的外文修養，便去治近代史，根本就是兒戲之極。

自鴉片戰爭時期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海峽兩岸分治初期的海軍史(以後的事情，因檔案多未公開，研治方法不同，可暫不論)，處處都是涉外因素，沒有本領除網羅中外學者已參據的外國資料外，還能發掘前人(包括洋人)所未用過的外國資料，卻能夠臻達通盤貫徹，鉅細無遺的境界，可能性有多少，不待明言。大陸學者那套治學法寶能辦得到的，已差不多都做到了。再弄下去，恐怕不過把已有的認識東移西砌，變變組合，換換形式，充作新著而已。

以為僅看大陸刊物，甚至連臺灣、香港的書刊也不理，便可充專家之害，看看下列之例便知道。

出版不久的《中國海軍百科全書》是中國海軍司令部配合十餘個分佈各地的海軍學術單位合力推出來的煌然巨著(外表可如此說)，該可代表大陸上頂尖兒的學術成就。成績究竟如何，下開諸「真相」欄自有解釋：

頁1827，「逸仙」號條：

「逸仙」艦(Light Cruiser Yixian) 近代中國海軍的著名輕巡洋艦。由江南造船所建造，為紀念孫中山(號逸仙)而命名。1930年11月12日(孫中山誕辰日)舉行下水典禮，1931年11月竣工，編入中華民國海軍第一艦隊建制。排水量1,550噸，航速18節；艦體長82.29米，寬10.36米，吃水3.5米；主機功率2,940千瓦；裝備有艦首150毫米主砲一門，

^[34]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研究所於1982年6月創刊的《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是專為翻譯外文論文而設的期刊。這種期刊的存在無疑是自揭瘡疤之舉。只要看日人不會無聊到弄本專門期刊來翻譯外文日本近代史研究的文章便知此舉自辱的程度了。

艦尾140毫米副砲一門，75毫米高砲四門，47毫米高砲二門。1933年12月，參加鎮壓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活動。抗日戰爭中，1937年8月，為加強江陰阻塞線，海軍第一艦隊司令陳季良率領「平海」(旗艦)、「逸仙」、「寧海」、「應瑞」等艦部署在阻塞線前沿。9月22-23日遭日軍飛機輪番攻擊，「寧海」、「平海」二艦先後被炸沉。陳季良移駐「逸仙」，繼續指揮艦隊作戰。25日上午9時，「逸仙」艦又遭日軍十六架飛機輪番攻擊，其高射砲被炸失效後，用艦首主砲射擊，擊落日軍飛機兩架。「逸仙」艦機艙、舵艙被炸彈擊穿進水沉沒，艦員陣亡十四名、負傷八名(全錫珂)。

真相：

日人佔據江陰後，撈起沉擱(不是沉沒)的「逸仙」艦後，送去日本修理和改建。1938年5月12日編入日本海軍，易名「阿多田」號。改建工程於1939年9月完成後，該艦便成為海軍兵學校(在內海江田島)的練習艦。戰後該艦在日本修復後，送還上海，由上海艦隊指揮部於1946年8月22日代表中國收回，恢復原名，參役內戰。後隨國府遷臺，1958年6月1日退役。1959年5月19日，當鐵料售予拆船商。參考《申報》，1946年8月25日，〈參觀「逸仙」號軍艦，禁不住感慨回憶〉條；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臺北)所藏「國軍檔案」，623/2841，〈艦艇服役案〉中之〈「逸仙」接收事轉報總部〉(1946年9月2日)等件；Anthony J. Watts and Brian G. Gordon,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London: Macdonald, 1971), pp.414-415; Hansgeorg Jentschura, Dieter Jung, and Peter Michel, *Warships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1869-1945*, trans. Antony Preston and J. D. Brown (London: Arms and Armour Press, 1977), pp.271; Shizuo Fukui, *Japanese Naval Vessels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1), pp.92; 中國戰史大辭典兵器之部編審委員會，《中國戰史大辭典——兵器之部》(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6年)，下冊，頁773-774(以下該書簡稱《戰史兵器辭典》)；姚開陽，〈北伐七十週年紀念——黃金十年的國府海軍建設〉，《全球防衛雜誌》，153期(1997年5月)，頁82。

頁1382，「寧海」號條：

「寧海」號(Light Cruiser Ninghai)中華民國海軍的輕巡洋艦之一。1931

年，向日本訂購進該艦成套部件、設備，由江南造船所進行裝配，于翌年6月建成。編入中華民國海軍第一艦隊建制。排水量2,600噸，航速30節；艦體長109.8米，寬11.89米，型深6.71米，吃水4.57米；主機功率5,145千瓦；裝備140毫米雙聯主砲三座，80毫米副砲六門，魚雷發射管四具。配載水上飛機一架。1933年底「寧海」艦參加對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鎮壓活動。抗日戰爭爆發後，1937年8月，「寧海」與「平海」等艦部署在江陰阻塞線前沿，作為保衛阻塞線的第一線機動兵力。8月22日，「寧海」艦擊落日機一架。9月22日，日軍飛機三十餘架輪番攻擊阻塞線前沿各艦，「寧海」等艦集中火力抗擊，持續六小時，擊落日機一架。翌日，日軍又出動數十架飛機重點攻擊「平海」、「寧海」，二艦奮力抗擊，擊落日軍飛機五架，「寧海」艦錨鏈艙、彈藥艙被彈片擊穿進水，艦長陳宏泰重傷，高射砲手傷亡過半，終被日軍飛機炸沉(全錫珂)。

頁1399，「平海」號條：

「平海」號(Light Cruiser Pinghai)中華民國海軍的輕巡洋艦之一。1931年6月，由江南造船所承造，1937年4月建成。編入中華民國海軍第一艦隊建制，為該艦隊旗艦。排水量2,600噸，航速30節；艦體長109.7米，寬11.89米，型深6.71米，吃水3.96米；主機功率5,145千瓦；裝備140毫米雙聯裝主砲三座，76毫米副砲六門，魚雷發射管四具；配載水上飛機一架。抗日戰爭爆發後，1937年8月，與「逸仙」、「寧海」等艦部署在江陰阻塞線前沿，作為保衛江陰阻塞線的第一線機動兵力。艦隊司令陳季良駐艦指揮作戰。9月22日，遭日軍飛機輪番攻擊，「平海」艦受傷，艦長高憲申重傷，陣亡九人；擊落日機一架。23日，日軍飛機繼續攻擊，「平海」與「寧海」等艦奮力抗擊，擊落日軍飛機五架。「平海」號重傷，向江岸拖灘擱淺。後被日軍飛機炸毀(全錫珂)。

真相：

「寧海」的建造過程全部在日本播磨造船所完成，1931年2月10日安龍骨，同年10月10日下水，1932年7月31日竣工，費時共十七個月。全部砲械也是日製品。1932年8月26日駛抵上海，在這日期以前該艦

與江南造船所毫無關係。所謂購日本組件，在江南造船所裝配，全是憑空捏造的胡言。該條所說的細目待補訂者還有：排水量2,526噸（不是2,600噸）；馬力10,579匹，最高時速23.207浬（試航時），續航力5,000浬/時速12浬；副砲是單裝76公厘/40高角砲六門（不是80公厘）；53公分雙聯裝魚雷發射管二座（要說明夠清楚）；佈雷架二具；機關鎗十挺；掃雷具一套（以上三項全漏講）；除原有的一架水上偵察機「海寧一號」外（機庫設在中後段主桿下），江南造船所後於1933-1934年間另仿製一架「寧海二號」。

「平海」原擬按「寧海」的絕大部分藍圖在江南造船所建造。1931年6月28日安龍骨，旋發生九一八瀋陽事變，1932年復發生一二八淞滬事變，向日本訂購之鍋爐等件遲遲不到，日本並於1933年召回駐廠技術指導人員，工程由是停頓達半年之久。1935年獲德國海軍顧問團之助（故該艦終除日製砲械外，還配上德製砲械），終於在1935年9月15日下水。隨後開往日本相生港裝配日製砲械。1936年6月18日返回上海，始算工竣，前後歷時五年，與其純日製姊妹艦「寧海」號之僅需時十七個月，不能不說有天淵之別。該艦雖與「寧海」為同級艦，但因上述種種事故，和不攜艦載機，以及德人的參予，故其上層結構、武器數目和分佈與「寧海」頗有分別，該條所說的細目亦因而得作不少補訂：排水量2,448噸；馬力7,488匹，最高時速21.256浬，續航力5,000浬/時速12浬；副砲為德製單裝88公厘高角砲三門。

作者無中生有（如謂「寧海」在上海建造，指「平遠」有艦載機），和有而不講（如日人和德人之高度參予），在在給人企圖高誇二艦國產成分的印象。為這類刊物撰寫資料貧乏，識見嚴重落伍的稿件本已不可諒，倘扭曲史實以圖為狹隘民族主義服務尤不可恕。

日人繳獲「寧海」和「平海」後，易前者之名為「禦藏」，後者為「見島」，悉擬改建為練習艦。二艦雖被拖去日本，修復工程卻一直擱延。至1943年底，日人因南太平洋戰事屢告失利，艦隻補充維艱，始積極進行二艦之修建，並擬均改建為以防空為主要任務的海防艦。「禦藏」之修建期為自1943年12月至1944年6月28日，「見島」者為1944年1月4日至同年6月10日。期間兩艦於1944年6月1日又另換新名，「禦藏」易名為「五百島」號，「見島」易名為「八十島」號。「五百島」於1944年9月19日在日本本州禦前崎以南60浬（33°40' N, 138°18' E）被美國潛水艇「鮒魚」（Shad）號用魚雷擊沉。同年9月25日，「八十島」

號改稱為輕巡洋艦。該艦後於是年11月25日在菲律賓呂宋島聖地庫魯滋灣 (Santa Cruz Bay) 被美機炸沉 (15° 26' N, 119° 20' E)；或謂其殘骸後運回中國解體。這些事情，中國紀錄可說是處處空白。

上述四段所用的參考資料包括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所藏，771/1040.2，〈「平海」艦建造案〉，和771.1/3020，〈「寧海」艦建造案〉；Watts & Gordon,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pp.158; Jentschura, et al., *Warships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pp. 113; Roger Chesneau, ed., *Conway's All the World's Fighting Ships, 1902-1946* (London: Conway Maritime Press, 1980), pp.412-413; 許秋明，《日本海軍裝備》(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1985年)，頁214-215, 574-575; Toshio Tamura, "The Chinese Light Cruiser Ning Hai and Ping Hai (1930-1936)," *Warship International*, 22:2 (June 1985), pp. 118-131; C.C. Wright, "The Chinese Light Cruisers Ning Hai and Ping Hai (1930-1936): Documentary Annex," *Warship International*, 22:3 (September 1985), pp.228-249; 田村俊夫，〈中國巡洋艦「甯海」「平海」引揚〉，*Sea Power*, 1987年1期(1987年1月)，頁54-61; 木俣滋郎，《日本輕巡戰史》(東京：圖書出版社，1989年)，頁588-596, 662-663, 666, 671, 675; Erwin Sieche, *Die Kreuzer der K. und K. Marine (Wolfersheim - Berstadt: Podzun - Pallas - Verlag, 1994)*, pp. 47-48; 福井靜夫，《(寫真)日本海軍全艦艇史》(東京：KKベスイセラーズ，1994年)，上冊，#0739，下冊，#2373, 2374; 《戰史兵器辭典》，下冊，頁853-855; Eric Lacroix and Linton Wells II, *Japanese Cruisers of the Pacific War*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7), pp.684-695, 835-836; 姚開陽，〈黃金十年的國府海軍建設〉，頁83-84。

三條既無獨有偶地，同出一人之手，^[35] 或有人會指為未必夠代表性。但這本辭典並非個人書刊，編撰過程廣涉全國主要海軍研究機構，既有人強馬眾的編委組織，也少不了有嚴密的審稿制度，絕不會一成不變地來稿照登。這些條項之錯得一塌糊塗，除作者的孤陋寡聞外，編審者看不出錯誤來當亦是原因。不少對海軍史有興趣的臺灣大學生都能寫得出紮實、準確不知多少倍的文章來，

^[35] 此三條的作者全錫珂是這本《中國海軍百科全書》的副主編之一，又是該書「海軍後勤門類」兩主編之一。他也是前此出版的《海軍大辭典》的副主編之一。研著海軍史對他來說，不該是牛刀初試之舉，以致寫得錯到令人不忍卒睹。

主因很清楚，在臺吸納境外新知容易得多也。大陸學界弄到這般田地，根由於研究者和研究機構閉關自守，以為大陸境內萬樣足，不屑外求，不肯溝通。這種心態的作祟，機構的軍方背景愈是濃厚愈是明顯。問題的癥結其實很簡單。用上舉三條項為例，資料的稀少和陳舊，信息的遲慢和隔絕，簡直到了歎為觀止的境界！有關的消息好些早在七十年代初已公開了，大陸上的專家竟過了二十多年仍一無所知。歐美書刊不理，臺灣刊物不管，還可以試用砌詞來強辯，那麼不看八十年代中期在北京出版的許秋明書又該怎樣解釋（那時我遠在夏威夷，也可以用郵購辦法自香港買得）？要求一本由國家海軍部編刊的大型書籍起碼能反映出版前五年世界性行頭的知識水準不是不合理的。

「海軍史研究書刊」最後所列的董晨鵬(1966-?)《炮打紫石英號》代表另一種格局。書末佔紙兩頁的「重要參考文獻」(頁361-362)列的全是英方檔案和英文書。雖已公開而尚未正式刊行的檔案絕非易見之物，一般國家情形均如此；要看此等檔案通常都要遠道去相關國家的檔案館取經。涉及「紫石英」(Amethyst, 1,350噸, 1934年)號事件的英方檔案均屬此類，但董晨鵬顯然未在英國檔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消磨過任何時間。書中的注也絲毫不解釋何處用了英方何檔何件以及所引用文件的個別編號、日期和標題。該書述事如何得益於參考那些英文資料復基本上不作交代。董晨鵬僅說他參考過近二十萬字的英文資料(意指檔案和書刊)，一半是他自己翻譯的，另一半是朋友代翻譯的(〈後記〉, 頁368)。這樣一說真夠顯示性。英文資料不能隨看隨用，要翻譯出來才能用，可見此君英文程度之低。那麼讀者還能信任他對這些英文資料的理解和依據此理解所作的結論嗎？況且翻譯者還不足二十萬字，又何其少！單是一本西方研究此役最新最全的Malcolm H. Murfett, *Hostage on the Yangtze: Britain, China, and the Amethyst Crisis of 1949*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1) 就何止二十萬字！如此就不能不問此君曾否詳用其所開列的英文資料？會否某英文書僅抽譯若干段落便算用過該書？會否某英文書引用某英方檔案他就算自己用了該檔？更嚴重的是不開列與英方檔案和英文書刊相對的中方檔案(僅在頁248之注一類地方有些蛛絲馬跡般的消息)和中文專書。難道中方的相對資料稱不上是「重要參考文獻」嗎？書中各注僅引中文資料，但所列者大率為無關痛癢之物。這現象要解釋並不難。正如上述，他究竟真正用過些甚麼英文資料並無明確交代，而有關該役的中方檔案多尚未公開，大陸上的研究者又從未用此課題寫過符合學術要求的書。這客觀情況並非作者應負責的。為何不在顯眼的地方開宗明義地說明？其實就算中方檔案未公開，又無夠水準的中文書刊可參看，起碼還有很多不容忽略，且不難得讀的資料。那就是「紫石英」事件發生的三個多月間(1949年4月20日至

7月30日)上海、香港等地報紙天天都有的詳細報道。此等報道等同一手資料，而當日上海的《申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 (《字林西報》)等，香港的《華僑日報》、《星島日報》、《大公報》、《文匯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華早報》)等都不是研究者可以砌詞說看不到之物。《申報》不就整套複製，公開發售了快二十年！其他都有顯微膠卷和光碟供應。此書書首用整頁的篇幅排印出「軍事科學院軍史專家」對此書的審讀意見，稱其「整理國內外有關檔案資料」。這種浮誇之言，竊不敢苟同。

大陸上的學者當然不是全部都是這樣差勁的。上開〈海軍史研究書刊〉中所列諸書，以姜鳴(1957-?)者最能給讀者留下新鮮感。除了時有創見和肯用較清楚的注釋(雖然在程度上和海外的要求還有好一段距離)外，他之偶引些罕見的西方資料，如*Naval Annual*和*Warship International*，確別樹一格，令人刮目相看(雖然他所用的西方資料還不算多)。姜鳴雖已改行從事股票業，去夏有幸和他結識，他對海軍史的興趣並無減易，且正銳意增修其《龍旗飄揚的艦隊》，再闖江湖，指日可待。

2. 不懂世界海軍史和不具備斷代性的海軍知識

自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海軍是發展最快速的兵種，三四年一小變，十年八載一大變。連職業海軍人士都會不大明瞭四五十年前的裝備(艦種、武器、後勤設備等)和戰術(裝備更進，戰術觀念隨而變化，故戰術正確與否，並無永恆不變的衡量法則，而僅能按涉及時段的觀念作有時間規限性的斷語)，更遑論時間更久者。研究某國某段時期的海軍史，絕不能孤立地看，一定要明瞭那時段世界海軍的發展情況(特別是敵對國家的情況)，以及掌握各種有關裝備的細節知識，始能達到中外貫通，宏觀微觀兼顧之境。沒有符合這條件而談論技術性的事，不大放厥詞才怪。

例一：中法甲申戰爭馬江之役(1894年8月23日)，法方用魚雷攻擊閩洋海軍艦隻「揚武」(1,560噸，1872年建成)和「福星」(515噸，1,870年建成)，大陸出版的各種研究報告都說法方艦隻逼近「發射」魚雷。^[36]後來法方在1895年2月14-15日晚上用同樣的武器攻擊困於浙江石浦港的南洋海軍艦隻「馭遠」(2,800噸，1875年建成)和「澄慶」(1,268噸，1880年建成；法方指該艦為中方所自沉)，大陸上

^[36] 這種糊塗事，舉三例就夠了。(一)楊東梁，《大清福建海軍的創建與覆沒》，頁80，指「當『揚武』艦發砲還擊時，法國的第46號魚雷艇向其左舷中間部分衝去，並發射一枚水雷(裝有十三公斤綿火藥)，『揚武』被水雷擊中後，……」。(二)海

的研究報告照樣說法方「發射」魚雷。^[37]那曉得法方用的並不是甚麼新穎武器，而是已經過時的，不能發射的杆雷 (spar torpedo，法文作 porte-torpille，日文譯作「外裝水雷」)。^[38]馬江和石浦兩役竟還是世界海軍史上的一個里程碑：杆雷最後兩次用於實戰。^[39]我以前問過1931年畢業於福州海軍學校航海班第三屆，後復留英深造的鄭天杰 (1911-1994) 甚麼是 spar torpedo，他根本不知道曾經有過這樣的玩意；剛在注中徵引的好一些中外資料 (以他在世時已出版者為限) 顯然他全都未看過。只要討論的時段過了四五十年，職業海軍人士研究海軍史並不佔多大便宜，這是一顯例。

軍司令部近代中國海軍編輯部，《近代中國海軍》，頁269-270，說「46號、45號魚雷艇在『伏爾達』號掩護下迅速衝向上游，向『揚武』號、『福星』號發射魚雷。……『福星』號……就被(中略)45號魚雷艇發的魚雷擊中，……」。(三)趙振愚主編，《中外海戰大全》，頁258，謂「敵46號魚雷艇發射的魚雷又擊中『揚武』號左舷」。首例不僅錯指那次法方所用的魚雷可以發射，還此雷與彼雷不分地誤記魚雷 (torpedo) 為絕對不能發射的水雷 (mine)。這種反映毫無海軍知識的錯誤或可解釋為私家著述，囿於見聞，勉強寫海軍史，不自量力，是過分熱心之失。但後兩者都不是私家著述，而是中國海軍部組配國內海軍專家所編寫之物，足反映大陸數十年來一貫的培訓和研究體系容成績臻達何層次的大型書刊。

^[37] 海軍司令部近代中國海軍編輯部，《近代中國海軍》，頁296，即用「發射魚雷」字樣。

^[38] 譯 spar torpedo 為杆雷早有近似的例子。許景澄譯之為「竿雷」，並就其性能作若干解釋；見《許文肅公遺集》(民國七年外交部圖書館本)，「外集附錄」，葉39下至40上。早期魚雷艇所用的杆雷究竟是甚麼玩意，為何不能發射，以及法人如何在這兩次中法海役使用 porte-torpille，讓我賣弄關子。想知道答案者看了下列西方十九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的海軍專書，自然會知分曉：W. R. King, *Torpedoes: Their Invention and Use, From the First Application to the Art of War to the Present Time* (Washington, 1866), pp.7-9; Edward W. Very, *Navies of the World*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880), pp.334-338, 340, 352-353; *A Naval Encyclopedia Comprising a Dictionary of Nautical Words and Phrases, Biographical Notices and Records of Officers* (Philadelphia: L.R. Hamersly & Co., 1881), pp.766, 813; J. W. King, *The Warships of Navies of the World* (Boston: A. Williams and Company, 1882), pp.582, 585-595; W.W. Reisinger, "Torpedoes," *United States Navy Institute Proceedings*, 14:3 (1888), pp.484, 490-492, 499-501; C. Steeman, *Torpedoes and Torpedo Warfare*, Second edition (Portsmouth: Griffin and Co., 1897), pp.224-228; Fred Jane, *The Torpedo in Peace and War* (London: W. Thacker & Co., 1898), pp.16; R. O. Crowley, "The Confederate Torpedo Service," *Century Magazine*, 56:2 (June 1898), pp.290-330。其實杆雷的研論從未停頓過，不一定要看十九世紀的古董刊物才能知曉。二十世紀初以來的討論就有 G. E. Armstrong, *Torpedoes and Torpedo Vessels* (London: George Bell and Sons, 1901), pp.71-78; Nathaniel Barneby, *Naval Development in the Century* (Toronto: Linscott Publishing Company, 1904), pp.166; William Hovgaard, *Modern History of Warships* (London: E. & F.N. Spon, 1920), pp.51, 440, 451; Eleanor C. Barnes, *Alfred*

例二：大陸上出版的海軍史論著談到北洋海軍的兩艘德製鐵甲艦「定遠」、
「鎮遠」時，必定盛稱它們如何威猛，如何空前。那想到它們是中國出資，讓德
國海軍做失敗實驗的產品！把主砲裝置成 en échelon 的斜置模式不僅大大減縮
射角，發砲時還會對甲板做成很大的破壞！況且，按當日世界海軍發展的速度
而言，這兩艦的設計到了甲午戰爭時已是相當落伍的了。何威猛之有？^[40]

Yarrow: His Wife and Work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 Co., 1923), pp.71-73; Peter Bethel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rpedo (Part 1)," *Engineering*, 159 (May 1945), pp. 443; Jack Coggins, *Arms and Equipment of the Civil War* (Garden City: Doubleday & Company, 1962), pp.149-150; Donald Macintyre and B.W. Bathe, *Man-of-War: A History of the Combat Vessel* (New York: McGraw Hill Book Company, 1969), pp.157; I. A. Grant. "The Herreshoff Spar Torpedo Boats of 1878-1880," *Warship International*, 14:3 (July 1977), pp.253-261; Roger Chesneau and Eugene M. Kolesrick, ed., *Conway's All the World's Fighting Ships* (London: Conway Maritime Press, 1979), pp.132, 136, 330-331 (以下該書簡稱 *Conway 1860-1905*); David Lyon, *The Ship: Steam, Steel and Torpedoes, The Warships of the 19th Century*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80), pp.46-48; Colin White, *Victoria's Navy: The Heyday of Steam* (Havant, Hampshire: Kenneth Mason, 1983), pp.59; Peter Pry and Richard Zeitlin, "Torpedo Boats: Secret Weapons of the South," *Warship International*, 21:4 (December 1984), pp.384-393; Jean Labayle-Couhat, "Le torpilleur des origines à 1900," dans *Marine et technique au XIV^e siècle: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Paris: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Marine, Institut d'histoire des conflits contemporains, 1988), pp.445; Edwyn Gray, *The Devil's Device: Robert Whitehead and the History of the Torpedo*, Revised edition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1), pp. 74-75, 275; David Lyon, "Underwater Warfare and the Torpedo Boat," in Robert Gardiner, ed., *Steam, Steel, and Shellfire: The Steam Warship, 1815-1905* (London: Conway Maritime Press, 1992), pp.134-136, 138-139, 141; Lincoln P. Paine, *Warships of the World to 1900*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0), pp.xix, 45,118; Richard Hill, *War at Sea in the Ironclad Age* (London: Cassell and Co., 2000), pp.61-63, 132-133, 137; R. Thomas Campbell, *Hunters of the Night: Confederate Torpedo Boats in the War between the States* (Shippensburg, Pa.: Burd Stress Press, 2000), pp.14-17, 44, 58, 67, 74, 92-94, 103-104, 115-116; Richard N. J. Wright, *The Chinese Steam Navy, 1862-1945* (London: Chatham Publishing, 2000), pp.64-65; Laurence Sondhans, *Naval Warfare, 1815-1914* (London: Routledge, 2001), pp.81, 83, 110, 123; Paul H. Silverstone, *Civil War Navies, 1855-1883*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1), pp.165-167; Richard V. Simpson, *Building the Mosquito Fleet: The U.S Navy's First Torpedo Boats* (Charleston: Arcadia Publishing, 2001), pp.14-17; Angus Konstam, *Confederate Submarines and Torpedo Vessels, 1861-65* (Oxford: Osprey Publishing, 2004), pp.5-7,20-21. 此注開列的資料，寒齋悉數齊備，絕大多數都不能說是夢寐難求之物。

^[39] Edwyn Gary, *The Devil's Device*, pp. 75, 275.

^[40] 此事很複雜，且若不從世界造艦史的角度入手，絕不可能道出真相，容另文解說。

3. 勿略艦隻的中心性地位

沒有艦隻就沒有海軍，沒有海軍就談不上海防，更不必說海權了。大陸上半世紀所刊的海軍史研究報告能充分照料艦隻者，尚未得見。談到艦隻時，充其量僅稍交代艦種、排水量、馬力、建造期和砲數(至多也只能說到某口徑的砲有幾門，便無法再作說明了)，便算任務完畢。即使資料的提供果可以此程度為滿足，資料也往往是輾轉傳抄回來的準確程度足堪見疑。

這種亂抄亂說的情形，可舉一例來說明。粵洋海軍北調以致悉於甲午戰爭或告毀或被擄的「廣甲」(1,296噸，1888年建成)、「廣乙」(1,000噸，1892年建成)、「廣丙」(1,000噸，1892年建成)三艦，有說均為巡洋艦；^[41]有說「廣甲」是巡洋艦，「廣乙」是魚雷砲艦，而「廣乙」的姊妹艦「廣丙」則是砲艦；^[42]有先說「廣甲」是砲艦，「廣乙」和「廣丙」都是魚雷快艦，然而再說「廣甲」是巡洋艦，而「廣乙」和「廣丙」同為魚雷巡洋艦。^[43]單看諸人說得如此分歧，便知彼等對艦種如何缺乏認識，以致漫不經意替此等艦隻亂貼艦種標記。若按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艦隻分類法，「廣甲」是木殼鐵脅通報艦(composite despatch vessel)，「廣乙」和

^[41] 孫克復、關捷，《甲午中日海戰史》，頁32，89，112；姜鳴，《中國近代海軍史事日志》，頁284，307-308。

^[42] 林濂藩，《中日甲午海戰百年祭》，頁51，71。此書作者林濂藩(福州海軍學校航海班第六屆[1935年])雖然旅美前任國府海軍軍官，卻看不出其曾利用長居美國之便網羅西方資料，大陸上的姜鳴直接引用西方資料就比他豐富得多，珍貴得多(詳後正文)，其書又刊於大陸，故沒有必要視其為海外研究者。林濂藩真正直接用過的西方書刊僅一種，即Allen Westcott, *A History of Sea Power* (New York: Doubleday, 1920)。這是不交代史源且老舊的一般性讀物，嚴肅的學術研究不會引用這類書刊的。他卻引用再四，還在頁98引錄一大段，且加上中譯，作為論證，真是莫名其妙之極。Westcott(林雖引用其書多次，卻從不提此君之名)究竟是何方神聖，為何足奉為權威，林濂藩也不作隻字解釋(看情形，他根本不知道Westcott是誰)。難道凡是洋人就是權威(清末李鴻章輩的思維!)？或者因為包遵彭早在初版《中國海軍史》中已引用此書，林遂以為是非引不可之物。他沒有想清楚，五十年代初在臺灣和八九十年代在美國找西方資料，寡豐之異與難易之分，何啻天淵之別。其實Westcott書那類通俗讀物在西方何止恆河沙數，有關甲午諸海役而真正值得參據的西方資料(從原始史料到學術著述)，數以百計，他卻全不管。不把林看作海外研究者，理所當然。

^[43] 戚其章，《北洋艦隊》，頁10，26。

「廣丙」則是魚雷砲艦^[44]——即早期驅逐艦尚在實驗階段時曾短暫採用過的艦種。當時的通報艦雖然可視為低層次的巡洋艦，但巡洋艦現已演進為最大型的水面戰鬥性艦隻，稱通報艦為巡洋艦必會引起今人不必要的誤解。魚雷巡洋艦（torpedo cruiser）又是另一種存在時間甚短的玩意：它是大型而速度不足的遠航魚雷艇，卻由此而演變成後來的輕巡洋艦。^[45]只要明白在西方稱為魚雷巡洋艦的艦隻是怎樣子的，就會知道「廣乙」、「廣丙」顯然不屬此艦種。不明白有關艦隻的性能，如何理解它們在作戰時的表現！

理解艦隻性能所必須掌握的資料，除了容易想得到的艦種、排水量、馬力和時速外，還得包括：級別（class）（特別是外購艦多有設計所賴的模型，故指出其級別是有意義的）、安龍骨日期、下水日期、建成日期、長寬吃水、儲燃料量、續航力、護甲情況（各部分不同）、砲塔情況（形式、分佈、位置）、砲械數據（前裝／後裝／來福線、口徑／身倍、單裝／雙聯、數目／分佈／位置、射界／仰角／俯角／旋回角度、砲彈種類／彈頭重量／拋射火藥量、初速／砲口能量、有效射程／最大射程、發射速度、備彈數）、魚雷發射管數據（口徑、數目、分佈／位置／裝置法〔固定／活動〕、魚電射程、備魚雷數）。四十年代新添的艦隻還得加上雷達和導火設備。

其中武器諸項最值得費神追查，殆因艦隻用以殲敵，海軍賴以生存者是武器。在一般近代史或洋務運動史（甚至軍事通史）著述中談到參戰某海役的艦隻時，僅謂某艦有某口徑主砲若干門、某口徑副砲若干門、速射門若干門、機關鎗／砲若干挺／門，通常已足。寫海軍史則絕不容如此馬虎了事。單說砲之口徑並不能確實反映艦隻的火力，速射砲和機關鎗／砲的實情尤易弄到籠統不清。機關／鎗砲可以用來舉一不太佔篇幅的例。清季中國海軍喜用哈乞開斯、努登飛、格林諸廠所製機關鎗／砲（添用路易士、馬克沁製品是入民國以後之

^[44] 見當時英國海軍部的艦隻情報和分類定則，Admiralty (Great Britain), *China: War Vessels and Torpedo Boats*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891), pp.60-61, 123. 並參考 *Conway 1860-1905* pp.399.

^[45] 魚雷巡洋艦存在的時間短，艘數有限，參考資料隨亦稀少。下開資料尚足提供基本認識：*Conway 1860-1905*, pp.80-81, 324, 346-347; E. H. H. Archibald, *The Fighting Ship of the Royal Navy, 897-1984*,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Military Press, 1984), pp. 144; Michael Burgess, *Cruisers of the World, 1873-1981* (Wellington, New Zealand: Burgess Media Services, 1985), pp. 21; David Lyon, "Underwater Warfare and the Torpedo Boat," pp.74; Chris Marshall, ed., *The Encyclopedia of Ships: The History and Specifications of Over 1200 Ships*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Books, 1995), pp.18, 247.

事)。此等名字在原始史料和近人研究中都不時出現，故讀者並不陌生。但倘擬在新舊中國刊物中尋找有關這些武器性能之資料就難了。如迄今尚僅說某艦有機關鎗 / 砲若干挺 / 門固然嚴重不足，點出用的是某廠製品仍是幫忙有限，因必須要追查到用的是何型 (model) 何款 (variant) 這層次，才能清楚交代那些武器的性能。要這樣做的原因並不複雜。單是格林鎗 / 砲便僅於1883-1900年間出產了供海軍用而性能有別的四基型和三別款之多 (專供陸軍用者尚未算在內)。^[46] 要理解一艘海軍艦隻的作戰能力，除了追查其大小武器的性能外，別無他法。

當然不是每艘艦都需要如此費神處理，但艦隊的主線艦隻、參加戰役的艦隻、其行動影響政局的艦隻 (如民國時期的「海圻」[4,300噸，1899年建成]、「海容」[2,680噸，1898年建成]、「肇和」[2,500噸，1912年建成]、「中山」[780噸，1913年建成])、其添置 (起碼在心理上) 足提升中國海軍力量的艦隻 (如抗戰前增置的「寧海」、「平海」)，均應在史料 (指天地間尚存的史料，不是井蛙自限地僅管中國境內有者) 和篇幅容許下儘量朝此方向走。

撰述有焦點，選用的範圍也必須有所偏重，不是每個題目都得用尋根究柢的方式去處理艦隻 (這種情形，學報論文比書尤顯)。但知見所及，大陸半世紀以來所刊中國近代海軍史著述從未對任何艦隻作過全面接觸式的探討 (僅姜鳴的《中國近代海軍史日志》書後所錄的諸艦型線圖可算是例外，但該部分所提供的艦隻數據仍是止於某艦有某口徑砲若干門的層次，且不時連口徑也不說)。即使在專研甲午戰爭諸海役的書裏，艦隻的照料亦僅限於弄些簡陋的中日參戰艦隻表。連「定遠」、「鎮遠」這樣重要的主線艦隻也得不到稍佳的照應，卻偏要強調此二艦如何威猛，如何空前！這樣的研究過程絕對馬虎，絕對不健全。在大陸上從事海軍史研究者集體長期漠視艦隻的中心地位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全面接觸的要求亦不應限於中國艦隻。與海軍有關的武裝衝突必然涉及起碼兩個相對的武力集團。就處理艦隻而言，中國的內戰 (軍閥間的戰事、國共內戰等) 尚算較易應付，因涉及外艦的可能性不高。研究涉外戰事則不同，給予外艦的注意力絕不該比花在中國艦者少。試問考述中法戰爭諸海役者有幾人確對當時的法國遠東艦隊做過逐艦研究的功夫？討論中蘇同江海戰 (1929年10月12日) 者有誰真能道出蘇方諸艦的細節？這兩問題的答案只可能是否定的。單從這點便不難看出大陸上迄今的中國海軍研究偏頗不全的程度。

^[46] 見 Joseph Berk, *The Gatling Gun: 19th Century Machines Gun to 21st Century Vulcan* (Boulder, Colorado: Paladin Press, 1991), pp.16.

不擁有有關的專業知識(指研究時段的專業知識，不是指日後的專業知識，故上云職業海軍人士治海軍史所佔便宜頗有限)而寫化學史、音樂史、股市史是無法想像之事。治海軍史所需專業知識的程度雖不比上舉諸例為低，不具備此先決條件而寫中國海軍史者卻竟佔從事者的大多數(大陸裏外情形均同)。此最教人吃驚之例莫如湯銳祥的《護法艦隊史》。按書的標題，艦隻的描述總該佔不少篇幅才對。豈料參加護法運動的艦隻竟完全沒有得到絲毫照料——不提供任何艦隻數據(最起碼不過的艦種、排水量、馬力、建造年、總砲數也不管)，連張參役艦隻艦名總單亦沒，有層次較高的艦隻數據和照片、型線圖更莫問了。書中提及艦隻的作用只是讓該艦之名在述事中穿插而已，並不提供讀者知道參役的艦隻是怎樣子的信息(那些艦隻的大小、火力和重要性均分別很大，此等差異絕非靠提供艦名可以反映出來的)。封面還畫了一艘根本不可能是艦的東西。讀者絕不必費神去猜作者究竟企圖用它來代表那一艘護法艦隻。那艘畫得長寬高度和各種上層建築全不合比例，悉不符規格的所謂艦，倘果有此物，一旦試航，必沉沒無疑。艦上還畫了一個像雷達的大圓網形裝備；護法運動時期(1917-1923)，雷達尚未發明，此舉豈非成了楊貴妃吃冰淇淋的笑話！

大陸上的研究者倘不突破缺乏討論時段的海軍艦隻專業知識(特別是世界性的知識)的困局，就難脫離原地踏步的窘境。

4. 不重視注釋和不提供追查外文資料的機制

不重視注釋是在大陸發展學術的大障礙。在彼等眼中，注釋是浪費篇幅的乏味無聊之物，隨便弄幾條，滿足一下形式就算。於是乎「注5、9、15、36、70、102見《籌辦夷務始末》卷11、34、21、8、50、46」，這種荒唐絕倫，寫了等於不寫的交代參考資料法便司空見慣，俯拾皆是。要知道愈是精深的研究，詳盡的注釋愈是不可或缺。要求詳細的注釋既可以使文抄公和胡亂杜撰者無所遁形，更可以保障學術傳承，明確地給後學提供按圖索驥，繼續探求之路。

其中胡亂杜撰者所闖的禍害較文抄公者尤烈，殆因彼輩憑空捏造之事可以藉轉抄而散播開去，致被視為事實。這種荒唐事舉一例就夠。上海人民出版社所刊的《中國近代艦艇工業史料集》外貌十分足觀。其述「逸仙」艦史事竟謂：

「逸仙」艦後被日軍打撈，修復，編入汪偽海軍。抗日戰爭勝利後，「逸仙」編入國民政府海軍海防艦隊，作為旗艦服務(頁926)。

「逸仙」艦從未在汪偽海軍服役過，^[47]自然不可能自汪海軍收編入國府海軍。該艦自日本運還給中國後亦從未用作旗艦。^[48]要是學術刊物必須事事用明確交代史源，這種胡言亂語自難有存在的空間。

還有一近似的情形，就是引用歐文和日文資料時，題目(論文、書籍、期刊、檔案等名稱)總是一翻了之，而不提供原題。不同作者翻譯相同的題目可以翻成不同的樣子。歐美人員的姓名處理得同樣笨拙，必然一音一漢字，每單位之間加小圓黑點，機械化地翻(歐美姓氏時有不按成規發音之例，誰保證那些音譯者能讀得準？附加原名，起碼提供一層保障)，翻出來的也無法統一，而肯附原名者畢竟只是極少數。結果就是無端端製造亂局。其實遇到外文題目，根本就不必翻，原題照錄就是，何必做徒耗篇幅，而得不到絲毫實益之事(歐美人士姓名可以音譯，但首見處必須附原名)。對不懂外文者而言，翻得再準也帶不出按圖索驥的作用。原題照抄，懂外文者就受惠不淺，不必猜測原文是甚麼，可即逕去追查原件。試想如果本文注^[38]所列的洋資料僅漢翻出之，而不列原題，不必待多久，連我自己也會看不懂。道理這樣簡單，竟無人鼓勵外文資料原題照列的辦法！

5. 刊物傾向商業化

在金錢掛帥的大環境下，恐怕以後連再出版《近代中國海軍史》、《中華民國海軍通史》那類差強人意，而有顯明局限性的書也不容易。代之而興的是隨意說說故事，只求銷路的貨色。裝作學術模樣的書刊，因為市場沒有要求嚴格注釋，很易便可以拼湊出爐。要出版質量均優而市場有限的書(如蘇小東的《中華民國海軍史事日志》)，困難的程度也就不必多說了。

^[47] 參見片桐大自(陳寶蓮等譯)，《聯合艦隊軍艦大全》(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日文原書刊於1988年)，頁593-594；馬幼垣，〈汪偽海軍艦隻初探〉，收入張玉法主編，《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1998年)，下冊，頁665-727。

^[48] 參考《戰史兵器辭典》，下冊，頁774；姚開陽，〈黃金十年的國府海軍建設〉，頁81-82。

6. 不避免無謂重複

在上舉「海軍史研究書刊」項中開列的書籍，有關「中山」艦者異常矚目。數目多，而且除了一本較早期者外，全是打撈「中山」艦以後才出版的，明顯是為了趕市場。此等書籍極重複之能事，毫不足奇。比重複更嚴重的是好些重要事項各書都不照料。譬如說，這麼多講述「中山」艦艦史的書籍竟沒有一本能為該艦提供張像個樣子的型線圖！層次較高的剖面圖更莫問了。這些書又全都說不出日本設計「永豐」（「中山」艦的原名）、「永翔」兩姊妹艦時所用的模型是日海軍的「嵯峨」號砲艦（785噸，1912年；該級艦僅一艘）。^[49]在修復出水後的「中山」艦的過程中，聞說找不到「永豐」、「永翔」的原建藍圖來作依據。那麼設計原出於「嵯峨」艦的消息就很重要。倘知道這消息，就可試覓「嵯峨」的藍圖。爭前恐後地推出的一大堆「中山」艦專書，卻沒有一本能照料到這些基本事情，研究偏頗的程度，和以為虛量足以代表研究水準的誤解程度，不用多說。

7. 選題受政治因素影響

選擇民國時期的課題所受政治因素的影響較清季為嚴重。北伐時期的海軍活動、滿洲國海軍、汪偽海軍、抗戰後期海軍所受英美的援助（此題如用冷嘲熱諷的態度去寫倒符合大陸的政治要求）等項目，由於早有牢定的政治評價，都不容易吸引大陸學者選作大規模研究計劃的課題。

六、觀察

大陸上治近代海軍史者人數相當，出版量也可觀，成績如何，上面說夠了。歐美目前雖有積極從事研究中國海軍史的學者，但因為他們沒有漢學訓練的底

^[49]「永豐」、「永翔」艦在設計上和「嵯峨」艦的關連，見片桐大自，《聯合艦隊軍艦大全》，頁244；福井靜夫，《日本補助艦物語》（東京：光人社，1993年），頁73-74。

子，研究角度與取材範圍與中國學者殊別，成績非三言兩語可以下公平判斷，宜另文申說。港臺兩地從事者人數或可說不少，但見到那些所謂從事者偶爾發表的論文每為選談某籌海人士海防思想之作，便知究竟矣。彼等的慣用手法為自文集抄錄些段落，配上連接文字，便算討論了某人的海防思想。^[50]擴大至某時段的海防思想者亦好不到哪裏去，不過是引文段落抄錄自多幾本習見之書而已，寫出來的仍難免是文章略注釋稀之物。寫這類文章者幾乎絕不會想到要帶入當時世界各國流行的海防論的討論，以及當時與中國同步發展海軍，或在過去某歷史時段曾走過當時中國經歷的發展階段的國家之情形的考察，文章才會有意義。彼等習慣性地挪用海防、海權那類泛而虛的煌然大名詞來企圖遮掩自己壓根兒對海軍無認識的缺陋。這夥人打響治學招牌，其實只是排湊一下現成資料。虛張聲勢，實則是求簡得簡的冒充貨絕對沒有鼓勵的必要。

例外不能說沒有。本人和中央研究院 / 華東大學 (花蓮) 教授張力 (1954-?) 有幾個共同之處，值得特別說明：儘量網羅大陸、香港、臺灣、日本、歐美的新舊刊物，以盡看大陸和臺灣已公開的未刊檔案為必須的研究程序 (歐美和日本的檔案則還未真正接觸)，以詳盡交代細節和史源為責任所在 (因此注釋比正文字數多是常有之事)，遇到編輯用經費不足，篇幅不夠等不成理由的理由妄加刪削時 (卻一定有經費和篇幅去刊登劣文)，便採「寧為玉碎，不為瓦存」的態度，寧可不登，也不容製造謬種。另外海軍總司令部的陳孝惇 (1958-?) 儘量利用臺灣富藏的海軍檔案 (公開至六十年代初者)，勤於著述，每引檔案必詳細交代史源，從不苟且省略。在大陸上治海軍史者有幾人對行頭，對自己會力持這種固執！

後記

此文脫稿至今已有一好一段時間。雖然並沒有把考察時段下延的必要，補充的話還是要說的。這些話可分三方面來講。

^[50] 這種玩意有一極品可引以為例。張濟光，〈論康有為發展海軍的戰略思想〉，收入廣東炎黃文化研究會編，《嶺嶠春秋——嶺南文化論集 (三)》(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110-120。文內所引康有為的見解全部出自〈物質救國論〉和〈請計全局籌款以行新政築鐵路起海陸軍折〉兩篇僅偶談及海軍事宜的文章。

不定期分手冊出版的史料集倘見續刊的新冊，就在文內補足。張振鷗主編的《中法戰爭》史料集便是一例。

專題史料集雖續有出版，與海軍有關者則數目有限，但包括十分重要者。可舉為例者包括：

陳旭麓、顧廷龍、汪熙主編，《輪船招商局——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招商局與海軍在發展上經常互有關係。

國家圖書館分館，《清代軍政資料選粹》（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2年），冊10。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庚子事變清宮檔案匯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冊18。

《庚子事變清宮檔案匯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冊18。

國家圖書館分館，《清代光緒兵部奏稿》（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4年），冊13。

國家圖書館編，《張文襄公（未刊）電稿》（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資料複製中心，2005年），四十冊。此為張之洞於（光緒九至十四年）間（1883-18）所發電報的原稿，時間上大部分與張的兩廣總督任期（光緒十年四月至光緒十五年七月）膾含，而此亦為清季粵洋海軍發展最迅速之期。但此等電稿，並未收入正文所列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內》，且數量驚人，故珍貴異常。可惜這套價值連城的大型史料集僅印售六十份，頓成鳳毛麟角之物，得讀者誠十分幸運。

非看不可的新書很有限，下面開列者足為代表。正因為要介紹的書目不多，而2000年畢竟有分水作用（這點隨後再講），故稍易前文的體例，各者之後分別置評。

戚俊杰、劉玉明主編，《北洋海軍研究》，第2輯（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年）。前此不注冊輯數亦並不聲明會成為系列的首輯，故於1999年刊行時，應視為專書。現既知其出版模式，則當按不定期期刊來歸類。

姜鳴，《龍旗飄揚的艦隊——中國近代海軍興衰史》，修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此書與1991年首刊者，書名雖同，章節的處理亦近似，然改寫的程度很大，宜以新書視之。

陳詩啟，《中國近代海關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這是作者就其前著中國海關史晚清部分（1993年）和民國部分（1999年）合併增修而成之作。因為上文未收專治海關史之書，而海關與海軍雖各自發展，實則處處盤根互結，有此一本鉅細兼顧，篇幅浩瀚之著在手，可助治海軍史而無暇深究海關史事者理解種種背景情況。

陳貞壽，《圖說中國海軍史》（古代-1955）（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三冊。圖多字少，與書名配合，但圖片素質多惡劣，印刷技術亦差，可說是糟蹋題目，浪費資料。

劉傳標，《中國近代海軍職官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此書雖仍有錯誤（如頁1首段把英人李泰國 [Horatio Nelson Lay, 1832-1898] 之名弄成 Horatain Nelsomlay，就教人懷疑究竟作者懂得多少英文。同頁「中英聯合艦隊職官表」的錯誤也夠明顯，Burgo Yne [出現兩次] 和 Salwey 二名就必錯無疑），整體而言，則異常有用，提供很多不見別處的資料。

蘇小東，《甲午中日海戰》（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這是該出版社和山東威海市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合作出版的《勿忘甲午叢書》中的一種（除上述《北洋海軍研究》二輯外，迄見書九本）。這套叢書顯然預定作者必須嚴守的篇幅長度。試看各書厚度很統一，不論題目的性質如何，厚的薄的最多相差五六十頁，便可知矣。以此書而言，這麼複雜的大題目，一般開本還用不到二百頁，實在太侷促了。結果一本講海戰的書全不交代雙方出動的船隻的戰鬥力量（僅若干中方艦隻提提排水量，日方船隻一般連這一丁點兒消息也沒有），亦不提供海戰進展圖，連一般的地圖也不見一張，更不要說上文提出的要求，講海戰一定要詳細交代雙方參戰艦隻的各項數據。如果出版條件太苛刻，左限右制，寫不出符合題目性質的書來，作者寧可放棄合約，未嘗不是慎重之舉。

孫修福、何玲編，《中國近代海關史大事記》（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5年）。以這本自1840年記錄至1949年的大事記與姜鳴的《中國近代海軍史事日志》和蘇小東之《中國民國海軍史事日志》合用，必三得益彰。

上文說過 2000 年是分水嶺。關鍵在最近幾年國際資訊網站大大開展了大陸學者的視野，加上年青一代外文能力較高，閱讀範圍遂大幅推擴。與此配合的是印刷、用紙均佳，圖文並茂的軍事雜誌爭相出爐，大增出版園地。有關的網站和雜誌都明顯以艦隻為焦點，帶來的好處也夠明顯，即修正以前不管艦隻便大談海軍史事的流弊。改變的時間雖尚短，只要維持下去就必會帶出可喜的新局面來。

不過光靠網站，抄湊成章，進景仍有限。網站絕大多數都是玩票性質。何時見過有網站每說一事必詳細注明史源？每陳一見必反覆辯證？互相抄襲更是網站的特色。單靠網站而不直接從文獻資料來取知識始終是危險之事，故網站只應視為補充性的工具，而不應用作資料的主要來源。

網站的生命可以很短。站主不再支付維持費用或者死去，那個網站就會消失。正式出版的刊物怎也可以期望會有一兩百年的生命。這就是為何嚴格的學者不會花時間去組織網站的原因。大陸學者如想有確實的、能持久的突破，就得在善用網站之餘，儘管直接閱讀可助理解研究時段的世界海軍情況的資料(檔案、書籍、學報、報紙)，並視此等資料為信息的主要來源。單靠網站分明是取巧的懶惰行徑，而且還是準確程度無保證的行徑。況且真正的突破應是指通過發掘西方學者未及利用的史料去達到西方學者尚未理解的認識。通常只是用簡介方式集大成的網站絕不是可藉以達到突破境界的工具。